

中德建交之初： 一个外交官的亲历记

据新华社报道,德国总理默茨将于2月25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本文作者为中国驻奥地利原大使、原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主任,他记载了中德建交之初的亲历。

中国使馆最初建在波恩郊区一个叫尼德巴亨的村子里。初来时,我们在村中散步,一群德国孩子大叫“中国人来了!”有居民与我们打招呼,见我们会说德语,便与我们交流起来,双方都很愉快。时间长了,他们邀请我们到家中小坐,喝杯咖啡聊聊天。

这些居民多为普通职工。我认识一对小学教员夫妇,新婚不久,在村里置地建房,最初只是一层楼的小屋,后来有了孩子,又加盖了第二层和第三层。搭建房顶上木梁时,还请了亲友来帮忙。不过五六年间,就眼见他们的小家建成了,房屋不大,小小的庭院,布置得井井有条。

德国人的家庭也不是朝夕之间富裕起来的。记得有一次我坐火车去慕尼黑,车厢里坐着三四位德国老太太,我们高兴地聊了起来。我看她们大多只带一只小行李箱,就以此为话题询问。她们告诉我,现在德国经济发达了,不论什么商品都可以买到,出门探亲访友往往想不出该买什么礼品。回想战后初期,人们普遍贫困,几乎都是一文不名;那时探亲访友能带的唯一礼品是自家做的酸菜。酸菜是德餐中不可缺少的配菜,每家做出的酸菜口味不同,品尝家制酸菜成为很大的乐趣。有位老太太看着我,无限感慨地说,那种日子过去了。

德国人守法,按规则办事,一丝不苟,虽然有时会稍欠灵活。使馆对面的小街上住有几家人,正对使馆的一户人家,老太太天天都出来将自己门前的人行道打扫得干干净净,遇到下雪天,更是及时将积雪扫掉。

后来我们了解到,德国法律规定,门前积雪不及时扫除的话,如果造成行人摔伤,房主要赔偿医疗费。因此一下雪,我们使馆

工作人员清早即起,将使馆门前的人行道打扫得干干净净。同事们谈笑风生,我至今怀念这段美好的时光。

1978年,谷牧副总理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西欧五国。期间,张彤大使要我陪同使馆商务参赞去向谷牧副总理介绍西德情况。西德当时属工业高度发达国家,机器制造、钢铁、化工、矿山设备和汽车制造业在世界上均名列前茅。谷牧副总理希望在西德多看一些地方,并与西德政府就加强两国经贸合作关系进行商谈。

十年动乱,中国与世隔绝。这次谷牧副总理出访西欧五国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大体上落后20年,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生产水平差距就更大。他曾回忆,西德一个露天煤矿年产煤5000万吨,一线工人只有900多名,最大的一台挖掘机日产40万吨矿岩量。而据《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梁衡所撰《40年前为什么要改革开放》,当时国内年产5000万吨的露天煤矿大约需要16万名工人。

从1978年到1980年,我在西德的最后两年是中国和西德贸易大幅度发展阶段。武钢和宝钢先后来访,都是购置成套轧钢设备,用于生产灌装可口可乐的薄钢片等。我陪同参观访问的最后一个国内代表团是来洽谈设备引进的露天煤矿代表团。商务谈判结束后,主人专门安排代表团乘坐直升机从空中俯瞰鲁尔工业区公园。只见山峦起伏,大大小小湖泊遍布其间,一片绿意葱茏。主人告诉我们,这是开采过的露天煤矿旧址。他们特别提醒我们,要及时建立绿化基金,不能听任矿山开采后留下一片秃山枯岭。

初到波恩,只见到到处都是大众汽车厂的甲壳虫汽车广告。当时广告在中国已销声匿迹二十多年,在处于短缺经济中的中国人看来,商品需要打广告是一件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没想到我回国后不久,中国也开始打广告了。杨成绪

拜年习俗的变迁与反思

新春佳节,亲友拜年,这是中国民间的传统习俗。它的起源,可追溯到远古时代。传说当时有一种叫“年”的怪兽,异常凶猛。每逢腊月三十晚上,它便出来挨家挨户地吃人。人们为免受其害,便把肉食放在门外,再把大门关上,躲在家里守岁。直到大年初一早上,人们开门见了面,得知对方未被“年”吃掉,便相互作揖拜贺,庆祝平安无事,从此便出现了拜年之俗。

随着历史的发展,拜年的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纯朴之中渐渐融入了虚假。特别是到了宋代,拜年之风日盛,而拜年的诚意也大打折扣。那时许多人并不亲自拜年,而是令仆人把自己的名片送到要拜者的家中。名片送到,就算上门拜年了。而仆人也会偷懒,并不将名片交给所拜之家的主人,而是将它塞进这家的门缝便万事大吉。这种敷衍潦草、投机取巧的拜年,往往会闹出笑话。南宋文学家周密在《癸辛杂识》中,就记了这样一件事:

节序交贺之礼,不能亲至者,每以束刺签名于上,使一仆遍投之,俗以为常。余表叔吴四丈性滑稽,适节日无仆可出,徘徊门首,恰友人沈子公仆送刺至,漫取视之,类皆亲故,于是酌之以酒,阴以己刺尽易之。沈仆不悟,因往遍投之,悉吴刺也。异日合并,因出沈刺大束,相与一笑,乡曲相传以为笑谈。文中,这位叫吴四丈的先生瞅准了名片拜年的空子,偷偷地将名片调了包,让沈家的仆人在不知不觉中替他去拜年。一件荒唐可笑的小事,却反映出当时拜年的虚假。

明清两代,社交性拜年的风俗比宋代更盛,也比宋代更虚伪。宋代人拜年,尚只给亲朋好友或有来往的人送拜年帖。而明清时人们拜年,范围却大得多,除亲朋好友外,连那些素无往来的人,

平时遇见连招呼都不打的人,过年时也送拜年帖。还有的人根本不认识所要拜的主人,只是“望门投帖”,把拜年帖盲目地乱投一番。如明代北京东西长安街的住户大多是朝廷官员。每到新年,来拜年的人特别多。拜年人根本不管所拜的对象是谁,只管从东街走到西街,一路“望门投帖”,挨家挨户投拜年帖。

正因拜年者缺乏诚意滥拜年,被拜者也就虚与应付,并不亲自接待,甚至也不派家仆在门口接待,只设门簿和“代僮”收帖。所谓“门簿”,指放在门口专供来访者登记的簿册。拜年者上门,不必见到主人,只在这登记簿上写下“某某拜贺”之类的话,就算拜过年了。所谓“代僮”,就是粘在门上的红纸袋,类似临时信箱,专门接受人们投来的拜年帖。因为它代替了家仆,所以称作“代僮”。拜年者只要把拜年帖投进“代僮”里,就算拜过年了。客人不想见主人,主人也不想见客人。有了这门簿和“代僮”,也就主客两便了。对这种虚假的拜年形式,许多有识之士都看不惯。明代大画家文徵明在《拜年》诗中就写道:“不求见面惟通刺,名纸朝来满敞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情嫌简不嫌虚。”辛辣地讽刺了这种言不由衷、虚伪应付的拜年风俗。

当然,现实生活中不乏真诚、美好、暖人心的拜年。比如,领导到群众家走访,借机听取群众意见,送上真诚的关怀和温暖;亲朋好友互致亲切问候,或交流一下思想,或相互关心体贴……这样的拜年都值得充分肯定。而发扬这种真诚有爱的拜年之风,摒弃虚假应付的拜年之弊,也正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戴永夏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